

文化
中国
世界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新论

甘阳
主编

梁展著

帝国的想象

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 梁展
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8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7534-5

I. ①帝… II. ①梁…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 K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94331 号

责任编辑 丁立松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2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 数 225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缘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 21 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 Arthur Wright 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

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

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 17 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 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年中秋于杭州

目 录

- 导言：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纠缠 1
- 一 帝国的崩解与再造
- 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的政治话语 20
- 布拉格的“中国人” 20
- 奥匈帝国的神话 27
- “大奥地利”方案 59
- 二 政治地理学与大同世界
- 康有为《大同书》的文明论谱系 84
- 文明话语实践与人种学的诞生 84
- 政治地理学与体质人类学 99
- 晚清外交危机与人种分类的知识与实践 114
- “烟剪人”、鲜卑与康有为殖民巴西的计划 130
- 种族改良与大同世界的构想 140

三 帝国与启蒙的前夜

《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中的土地、财富与东方主义 157

“莫卧儿-贝尔尼埃” 160

自由思想者眼中的焚祭礼和日食 167

印度洋贸易、财富和土地所有制 182

四 帝国与反叛的幽灵

法兰西革命年代的文人形象 204

密谋家 213

浪荡汉或波希米亚文人 227

幽 灵 240

五 自由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重思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 253

来自爱尔兰的中国海关关员 25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 277

自由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民族主义 315

导言：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纠缠

1917年6月，犹太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了摆脱埃及民族主义风暴给外国人带来的不安，母亲带着两岁的艾瑞克乘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赫勒万号”邮轮来到她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故乡——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不久前这座风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刚刚被意大利占领。数月后，霍布斯鲍姆一家移居维也纳郊区，艾瑞克在那里度过了喜忧参半的童年时光。在这个前多瑙河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新的奥地利国家首都，霍布斯鲍姆虽然没有机会亲历哈布斯堡帝国分崩离析的政治悲剧，但是共同生活在帝国内的德裔、斯拉夫人、马扎尔族群以及犹太人之间的政治、文化、语言冲突仍未远去。^[1]“假如说19世纪奠定的‘民族原则’曾经在某一时刻赢得了胜利的话，那么这个时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2]，离

[1] 参见 Richard J. Evans, *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44。

[2]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nd ed., p.131.

开维也纳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霍布斯鲍姆带着遥远的童年记忆论道，民族主义在1918—1950年之所以达到了高潮，究其原因，应当是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的崩溃和俄国革命的爆发所致。所谓“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显然是指历时50余载的奥地利—匈牙利帝国（1867—1918）。凡尔赛和会之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掲筑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民族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直绵延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很快成为历史，英、法殖民帝国元气大伤，苏联最终也未能摆脱解体的命运；在中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涌现，这让人们觉得，20世纪仿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纪”。

历史学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叙述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抹去民族—国家的帝国印迹以及它与帝国相互重叠和纠缠的“前史”，来服务于民族主义政治的现实需要。然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则尝试在全球史网络中考察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掘它们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彼此连接构成的复杂关系，并对过度依赖民族—国家视角的历史编纂学原则，即所谓“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做出质疑、反思和挑战。^[1]以德国殖民史、东亚（日本）史和全球史理论见长的塞巴斯提安·康拉德指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

[1] 2021年8月26—27日，皮埃尔·杜·布瓦基金会在瑞士日内瓦研究生学院举办了一场“方法论的民族主义”论坛，来自欧美国家的12位历史学家与会并发言，见 Cemil Aydin, Grace Ballor, Sebastian Conrad et al.,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1 [March 2022], pp.310-371。

中，帝国与民族—国家泾渭分明，然而将帝国看作是民族—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向外扩张的结果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帝国既是催化剂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碍：一方面，帝国的压迫培养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民族主义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是对“传统的发明”，它将“族裔、宗教、语言和地区的差异与联合人们起来反对外来统治的利益连接起来”。因此，作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本身正是借助基于交流和交换的目的而设立的帝国诸项制度和基础设施才成为可能，而且，作为政治枢纽的帝国中心反过来亦有利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滋生”；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如若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跨越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帝国这一障碍，换言之，如果后殖民国家要追求民族兴盛，帝国也就必须要解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念（即民族兴盛——引者）恰恰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对国内“落后民族”所肩负的“文明的使命”往往也能够使帝国预见到自身会缓慢没落的命运。^[1]因此，与其说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不如说它是民族—国家与帝国相互纠缠的历史。

在中东欧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马扎尔等的民族主义者纷纷指斥奥匈帝国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

[1] Sebastian Conrad,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1 [March 2022], pp.327-332.

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动员作用，然而，在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线展开的历史叙述中，中性意义上的帝国治理方式对国内族群的政治民族主义发展起到的催化作用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漠视。彼得·贾德森是在意大利欧洲大学任教的、中东欧历史学家，他在2016年推出的《奥匈帝国史：一部新史》中，分析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帝国境内各个族群“分而治之”的情况，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积极有效地利用帝国的族群治理政策服务于他们各自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选举活动的事实。^[1] 举例而言，1897年4月5日，帝国总理巴德尼颁布语言法令，要求在政府工作的德裔公务员能够熟练掌握捷克语，这个举措的初衷是要在波希米亚王国境内将捷克语提升到与德语同等重要的地位。感到利益受损的德裔族群立即走上街头，反对该法令的实施，并以言辞辱骂巴德尼本人，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以巴德尼被迫辞职才平息下去。在贾德森看来，巴德尼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奥匈帝国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国家决策的讨论当中，表明维也纳中央政府对波希米亚王国两大族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受到削弱，遂使波希米亚形成了除维也纳之外的另一个帝国中心。此外，政府为波希米亚王国单独制定法律的做法又引起与其毗邻相处的格拉茨或萨尔斯堡的不满，从而激发了当地人的民族平等意识。^[2] 由此可见，帝国非但没有构成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反而成了民族主义的摇篮。

[1] 参见 Pieter M.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 参见 Pieter M.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p.314。

若论帝国对内部民族主义的压迫，与奥匈帝国相比，英帝国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镇压显然更为残酷无情。在奥匈帝国解体 100 周年来临之际，贾德森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首先谈到了 1916 年在都柏林爆发的一次民族起义。4 月 24 日（复活节）清晨，1200 多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持枪攻占了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椭圆形地带，驻扎在这里的英军在经历了短暂的震惊之后，迅速从英国各地调集了多达数千名的士兵，甚至用战场上才使用的重炮猛烈轰击叛乱者构筑的街垒。数日后，起义者终于感到寡不敌众，被迫于 4 月 29—30 日向英军缴械投降。根据 2015 年英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这次起义一共造成至少 485 人死亡，其中有 260 名平民^[1]；2600 余人受伤，其中包含至少 2200 名平民以及 40 余名 17 岁以下少年儿童。尽管接受了对方的投降，驻爱尔兰英军总司令还是下令逮捕了 3500 余名叛乱者，处决了帕特里克·皮尔斯、詹姆斯·康诺利等 154 位领导者。在讲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贾德森刻意隐去了起义发生的地点。很多人会觉得，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民族起义一定爆发在奥匈帝国的某个边远省份，因为在 1916 年协约国战败迹象显露之际，奥匈帝国内部的族群冲突正愈演愈烈。

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帝国的末日，对于地方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自治要求，卡尔皇帝也表现得宽容有度。1918 年的秋天，在施蒂利亚州首府格拉茨，一批商业名流和工人迫切想要解决当地生活用品的供应问题，于是组成了“施蒂利

[1] 参见 Glasnevin Trust, *1916 Necrology*, March 2015。

亚州公共福利委员会”，决心斩断与奥匈帝国的纽带。该委员会同时致电卡尔皇帝和施蒂利亚州州长，请求他们赋予其在当地行使原本属于帝国政府的权力。维也纳方面不但同意了他们的诉求，而且命令州长将涉及当地物资供应和帝国内部贸易的权力全部移交给该委员会。贾德森就此评论道，这一做法体现了善于根据形势灵活应变的帝国传统。^[1]

在分析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的原因时，历史学家指出，起义的举动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通市民和公众舆论的支持：无论是英军的亲属，还是英爱联合派，连英国国会中的爱尔兰党派都对起义军心怀敌意，这一现象被贾德森概括为普通民众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漠视（indifference to nationhood）。在奥匈帝国晚期，语言常常被认定为甄别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以及衡量他对本族群是否忠诚的标准。在族群杂居的地方，语言成为政治斗争的“前线”，然而，与当地民族主义政治精英希望看到的态度相反，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贾德森细致地观察到，当地的农民拒绝将语言的划分转化为在自我认同甚至族群忠诚度方面的差别，相反，“操两种语言、对民族身份的漠视以及利用民族身份投机等现象，表现了双语地区地方文化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无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所谓现代化进程均无法予以摧毁”。^[2]因此，族群或民族身份的甄别和归属只是人们看待

[1] 参见 Pieter M. Judson, “‘Where our commonality is necessary...’: Rethinking the End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in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48 (2017): pp.1-21。

[2] Pieter M. Judson, *Guardians of the Nation: Activists on the Language Frontiers of Imperial Austr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

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而已，民族身份并非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事实，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决定一个人对其民族身份做出选择的因素不是生理特征或者语言特征，而是这个人所处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具体的生活情境。^[1]

一般认为，奥匈帝国的崩溃是维也纳中央政府对待各族群的不平等态度以及族群间的政治冲突所致。贾德森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精心营造出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恰恰是奥匈帝国借以表达其统治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导致帝国解体的原因并非族群政治，而是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在战争期间由大权在握的军官们制定、并得到皇帝和政府高级官员支持的军事管理措施，严重侵蚀了曾经受到普遍拥护的战前体制的合法性；其二是帝国的治理网络濒于崩溃，尤其是帝国中心越过地方政治精英领导人（他们本身往往是民族主义者）直接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的能力下降。^[2]

在长篇小说《诉讼》中，卡夫卡描绘了这样一个惨烈的场景：K先生在31岁生日当晚被闯入家中的两名陌生人无故带走，最后像“一条狗”^[3]那样被用来剪肉的一把锋利的剪刀插入胸膛而死。K先生的遭遇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作家对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生存困境的表现，以及“现代官僚世界及生活在这个迷宫般的世界当中无法找寻自己主体的一个巨大

[1] 参见 Pieter M. Judson, “Is Nationalism the New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7, Issue 1 [March 2022], pp.336-341.

[2] 参见 Pieter M. Judson, “‘Where our commonality is necessary...’: Rethinking the End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p.1-21.

[3] Franz Kafka, *Der Proceß*, Hrsg. Malcolm Pasley,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90, S. 312.